

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的应用及意义

史勇

1981年1月15日,国务院批转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关于加强文物工作的请示报告》,要求各省市区分别情况进行一次文物普查或文物复查工作。史称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简称“二普”)。至1989年底,除个别省份外,查明全国共有石窟寺、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刻、古生物化石、近现代史迹等不可移动文物34万余处。相较于“一普”,“二普”比较全面地对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进行了摸底,虽然受条件限制仍有不足,但其普查成果编研利用广度与深度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应用方式多元、影响深远。

根据“二普”成果重新公布原有文物保护单位

不同于此前的“一普”和此后的“三普”,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关于加强文物工作的请示报告》提出,在“二普”基础上,首要工作是对原已公布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经过调整和补充后重新公布。据不完全统计,“二普”前期相关省市重新公布省保单位近千处,择要举例如下:1981年4月,浙江省重新公布省保单位103处;同年9月,甘肃省重新公布省保单位228处,安徽省重新公布省保单位102处;1982年7月,天津市重新公布省保单位35处,河北省重新公布省保单位304处。1983年10月,湖南省重新公布省保单位154处;同年,黑龙江省重新公布省保单位34处。此项工作初步探索建立了已灭失或损毁文物保护单位的退出机制,在实践中以省保单位为主体,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承上启下、正本清源的意义。

根据“二普”成果核定公布新文物保护单位

1981年至1990年,国家及各省根据“二普”成果持续核定公布新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和1988年,国务院公布第二、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320处。这一时期,有20个省市区陆续分批次公布省(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共1696处。分年列举如下:1981年(吉林省公布第二批省保单位35处、湖北省公布第二批省保单位52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布第二批区保单位86处);1983年(云南省公布第二批省保单位33处、吉林省公布第二批区保单位9处);1984年(北京市公布第三批市保单位111处);1985年(福建省公布第二批省保单位58处、上海市公布市保单位3处和抗日纪念地1处);1986年(山西省公布第二批省保单位180处、河南省公布第二批省保单位274处、黑龙江省公布第二批省保单位54处、天津市公布第二批市保单位24处、内蒙古公布第二批区保单位33处);1987年(吉林省公布第四批省保单位27处、上海市公布第四批市保单位11处和革命纪念地6处、云南省公布第三批省保单位61处、江西省公布第三批省保单位140处);198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布第二批区保单位22处、青海省公布第五批省保单位49处);1989年(广东省公布第三批省保单位106处、安徽省公布第三批省保单位46处、浙江省公布第三批省保单位118处、辽宁省公布第四批省保单位99处);1990年(黑龙江省公布第三批省保单位32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布第三批区保单位33处)。“二普”结束后,有的省份仍继续根据普查成果核定公布省保单位。国家文物局老领导黄景略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各省当年公布的省保单位大部分都是“二普”成果。

根据“二普”成果编纂地方各级文物志

1981年2月28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在北京召开各省市区市文物文化局长会议,安排文物普查和文物志编写工作;将“二普”与文物志编纂同部署、同落实,这是“二普”成果转化应用又一重要方式和鲜明特点。中国传统方志大多将文物资料放在古迹、寺庙、金石等门类纲目中记叙,除金石录之外,不可移动文物鲜有专志收录。“二普”启动后,基层文物工作者纷纷表示,文物普查本身是极为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普查成果对于新修县志、文物志都是极为重要的资料,编写出版文物志关系到“二普”成果能否巩固的问题。本文以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物志为检索对象,入志不可移动文物资料以1981年为上限、1990年为下限(个别放宽至20世纪90年代初),满足检索条件的文物志最早出版于1982年、最晚出版于2006年,时间跨度25年;共計省级文物志9部、市州级文物志38部、县区级文物志69部,分地区区域列举如下。

华北地区:河北省(1市1县)、内蒙古自治区(1县);东北地区:辽宁省(1市)、吉林省(省本级及9市34县区)、黑龙江省(省本级及2县);华东地区:江苏省(省本级及2市1县)、山东省(省本级及2市1区)、浙江省(1市1县)、安徽省(1市1地区5县)、江西省(3县)、福建省(1市);中南地区:河南省(省本级及3市2县)、湖北省(省本级及3市)、湖南省(1市1地区)、广东省(1市1区1县)、海南省(1市2县);西南地区:四川省(省本级及2市2县)、贵州省(1市1地区3州3县)、云南省(2区)、西藏自治区(1市3县);西北地区:陕西省(省本级及2县)、甘肃省(2市1区)、宁夏回族自治区(1县)。以上百余部文物志属于血统比较纯正的“二普”成果应用于文物志编纂的实例。另有部分县市区虽完成文物志初稿但未能出版或印行。全国第二轮修志期间和“三普”启动前出版的若干省市级《文物志》以“二普”成果为基础资料,同时收录“二普”后新见文物考古成果,入志资料下限延伸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特例如《甘肃省志·文物志》属于第二轮合修,入志资料下限延伸至2010年。

基于“二普”成果编纂出版的首轮文物志产生较大影响,如香港学者王煜曾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物志发表书评称:“此地方志翔实流畅,不单裨益地理学家或贵州人,任何有心人阅读都不会后悔。书尾附录文物存目一览表,注明历史沿革及现状,又录黔东南州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方便查考”。结合“二普”开展的文物志编纂工作,既是新中国首轮修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整理保存和编研利用“二普”成果提供了适宜载体,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弘扬。

根据“二普”成果编辑出版文物地图集

新中国成立后两次文物普查特别是“二普”规模大、时间长、调查内容广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为系统整理和科学总结历次文物调查成果,国家文物局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文物地图集》(简称文物地图集)。此项工作是名副其实的世纪工程,从最早出版的广东分册到最晚出版的广西分册,时间跨度长达32年;其中辽宁、四川分册编辑出版历时20余年,山西分册编辑出版历时19年,湖北分册编辑出版历时14年,湖南分册编辑出版历时13年,陕西分册编辑出版历时12年。

前期出版的文物地图集集中体现了“二普”成果,如广东分册(1989年)、河南分册(1991年)、吉林分册(1993年)、青海分册(1996年)、湖南分册(1997年)、陕西分册(1998年)。后期出版之文物地图集除以“二普”成果为基础外,还大量吸纳“二普”后新见文物考古资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各省市区历次文物普查、专项文物调查、重大考古发现成果集成大成者。2001年至2010年期间出版之文物地图集有云南分册、天津分册、湖北分册、内蒙古分册、山西分册、福建分册、北京分册、山东分册、江苏分册、辽宁分册、浙江分册、四川分册、重庆分册、宁夏分册、西藏分册;2011年至2021年期间出版之文物地图集有甘肃分册、新疆分册、河北分册、安徽分册、黑龙江分册、上海分册、广西分册。

文物地图集的编辑出版,使文物普查成果进入“读图”时代,有助于简洁直观呈现各省市区市不可移动文物分布、种类、级别、时代等要素。文物地图集代表了同时代纸质图书和测绘产品较高水平,如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之湖北分册获2003年陕西省测绘优质产品奖;广东分册获1989年广东省优秀图书一等奖。此项工作促进了新技术运用推广,如福建分册文物分布图组设计与编制运用了GIS技术,数据库技术和数字印刷技术最新成果;江苏分册通过定制文物分类代码,实现文物对象自动上图和符号、位置、颜色、名称一次性自动展绘及文物记录索引自动生成;湖北分册利用Macintosh地图生产系统进行数据处理和成果输出,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地图学的科学性、艺术性和实用性。

国家文物行政部门曾定于1985年基本完成“二普”,1988年基本完成文物志编纂。但随着主客观环境变化,“二普”至20世纪80年代末方告结束,其普查成果转化应用跨度更长达40年,成为涵盖文物保护管理、地方志编纂、地图生产等领域的宏大系统工程。其意义在于:一是通过重新公布原有文物保护单位,为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正规化、科学化、法治化奠定了必要基础。二是通过配套的文物志编纂出版工作,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地方志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具有存史资政育人之功。三是通过文物地图集的编辑出版,见证了从手工操作到数字化生产的时代变迁,推进了中国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加工和地图生产技术的变革与进步。

就普查成果转化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而言,“二普”颇有“无心插柳成荫”之感,堪称“一次普查,成果共享,多方受益,影响深远”的典范。随着“四普”全面启动,普查成果除将在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和文物资源资产动态管理机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外,亦将为全国第三轮修志特别是各地《文物志》续修,以及未来文物地图集修订再版提供更为全面准确的基础资料,实现文物普查效益的最大化。

对于第二十届(2022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以下简称“十大精品”),诸多专家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精彩点评与总结,真知灼见,大有裨益。本文仅从数字角度,对27个人围终评的境内展览项目做一个简单梳理。数据来源为各项目申报材料。

一、常设展览与临时展览(个)

	常设展览	临时展览
入围	16	11
十大	8	2

入围终评的27个展览项目中,常设展览16个,临时展览11个,比例约为3:2;获得“十大精品”的展览项目中,常设展览8个,临时展览2个,比例为4:1。常设展览完胜临时展览。

常设展览的质量,明显高于临时展览。当然,这也是正常的。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常设展览一般都比临时展览用心要多、用力要大。后面我们还会从不同角度再次说明这个问题。

二、题材分布(个)

	历史文化	艺术	纪念	自然科技
入围	19	3	5	0
十大	6	0	4	0

从题材看,历史文化类展览依然占据较大优势。入围项目表现得更为明显。

本届最大遗憾是自然科技类展览申报数量过少,仅仅4个,且均未能入围终评。

自然科技类展览是深受观众喜爱的展览题材,但近几年申报数量都比较少,进入终评的自然更少。希望随着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建设,能让大家对自然科技类题材展览给予更多关注。

三、行政隶属关系分布(个)

	中央	省级	地级	县级	其他
入围	1	12	12	2	0
十大	1	4	3	2	0

无论入围终评的展览项目还是获得“十大精品”的展览项目,地县级博物馆均占据半壁江山,这反映出地县级博物馆展览水平进步明显。这也是本届活动的一大惊喜。正如本届评委所说,博物馆展览水平正在整体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

四、博物馆等级分布(个)

	一级	二级	三级	无级别
入围	18	3	1	5
十大	5	2	0	3

无论入围终评的展览项目还是获得“十大精品”的展览项目,国家一级博物馆数都占有绝对优势,说明一级博物馆的整体实力不容置疑。“十大精品”项目中有3个是无级别博物馆,但这3个都是新建馆,尚未参加定级,其实力不可小觑。从中可以看出,博物馆的级差比较明显,低级别博物馆想逆袭并不容易。

五、地区分布(个)

	华北	东北	华东	中南	西南	西北
入围	1	2	8	8	4	4
十大	1	2	3	2	0	2

整体看,各个地区都有项目入围,华东、中南地区优势明显。“十大精品”项目中,东中西部均有,华东地区小有优势,但西南地区,入围4个,却

数读“十大”

无一斩获,应该说比较遗憾。

六、经费使用

1. 总投资

万元	1亿以上	5000万—1亿	1000万—5000万	500万—1000万	100万—500万	100万以下
入围	1	6	9	3	7	1
十大	0	6	1	1	2	0

入围项目中,投资过亿的,只有1个,为1.5亿;1千万以上的,有16个;1千万以下的,有11个,其中100万以下的,仅有1个。

“十大精品”项目中,5000万以上的有6个;1000万以下的有3个;2个临展项目,均在500万以下。投资最多的,并没有获得“十大精品”。

2个临时展览,从经费使用角度看,无论总投资还是单价,都是最低的。

2个县级馆,总投资一个5000多万元,一个2000多万元,单价一个9000多元,一个8000多元,作为常设展览,中规中矩。但对于县级馆来说,这种投入也是巨大的,对于大多数县级馆来说,估计是难以企及的。

2. 单价

个	平方米单价	1万4以上	1.4万—1万	1万—5千	5千以下	1千以下
入围	5	9	9	9	3	4
十大	3	3	4	4	0	0

整体看,单价分布比较均衡。入围项目每平方米平均造价为0.93万元。其中常设展览平均为1.13万元,临时展览平均为0.22万元。临展与常设展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十大精品”项目每平方米平均造价1.04万元,其中常设展览平均1.16万元,临时展览平均0.14万元。差距更加明显。

入围项目中单价最高的,并没有获得“十大精品”。

“十大精品”项目单价最低的2个展览,都是临时展览,一个每平方米3000多元(王者归来),一个仅680元(和合中国)。8个常设展览中,单价超过1万元的有5个,有2个接近1万元,另一个不到5000元,总体看,入围项目每平方米造价基本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单价仅680元的项目能获得“十大精品”,也说明好展览不一定要有大投入。

七、展品数量

个	1000以上	1000—500	500—300	300—100	100以下
入围	9	6	6	5	1
十大	4	2	4	0	0

入围项目中,展品数量超过1000件的,有9个项目,其中2个项目超过了4000件。平均展品数量超过1000件。

“十大精品”项目中,1000件以上的,有4个项目。展品数量最多的,达到4891件(陕西考古博物馆基本陈列)。本届展览平均展品数量超过1200件。

从每延米展线看,入围项目中,每延米展品数量平均为1.5件;“十大精品”项目中,每延米展品数量平均为1.8件。

无论从展品总数讲还是从每延米展线数量看,本届入围项目的展品数量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反映出“让文物活起来”以后,博物馆对文物资源的发掘利用有了很大提升。

八、展览面积

1. 总面积

个	平方米	5000以上	5000—2000	2000—1000	1000以下
入围	5	14	6	2	
十大	4	4	2	0	

入围项目中,展览面积在2000—5000平方米的项目,占到了大多数。1000平方米以下有2个项目,均为临时展览。展览面积最大为8700平方米(西藏博物馆基本陈列),最小为600平方米(色如天相 器传千秋)。

“十大精品”项目均超过了1000平方米。展览面积最大为5938平方米(南国烽烟举红旗),展览面积最小为1295平方米(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细菌战罪证陈列),均为常设。2个临时展览,一个3738平方米(和合中国),一个1400平方米(王者归来)。

2. 平均面积(平方米)

	平均	常设	临时
入围	3208	4235	1712
十大	4246	4665	2569

入围展览平均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常设展览超过4000平方米。总体看规模比较大。“十大精品”项目平均值超过了入围项目,应该只是一种巧合。

九、展线长度

1. 总长度

个	米	大于1000	500—1000	500—300	小于300
入围	5	9	9	4	
十大	3	3	4	0	

入围项目中,展线长度大于300米的有23个,小于300米的有4个。“十大精品”项目中,均高于300米。随着博物馆展览内容的不断丰富,展厅面积和展线长度也随之出现了变大变长的趋势,增加了观众“博物馆疲劳”现象的发生,应该予以关注。

2. 平均长度(米)

	平均	常设	临时
入围	667	900	328
十大	720	640	393

入围项目中,展线长度最大为2231米(西藏博物馆基本陈列),最小为193米(色如天相 器传千秋)。

“十大精品”项目中,展线长度最大为1236米(郑州商代都城文明展),最小为207米(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细菌战罪证陈列);2个临时展览一个387米(和合中国),一个400米(王者归来)。

从展线长度也能看出,本届馆内获奖展览规模比较大,但是小展览也不是没有机会。

十、观众人数

1. 总人数

个	万人	大于50	50—30	30—10	小于10
入围	4	9	11	3	
十大	2	4	3	1	

2. 平均人数(万人)

	平均	常设	临时
入围	32.7	35.8	28.3
十大	35.5	41.3	12.6

入围项目中,最多的2个项目约86万人(纯粹江南技忆苏州86万人、新疆历史文物展85.8万人),最少的2个项目约9万人(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细菌战罪证陈列9.6万人、青海历史文物展8.7万人),且都是常设展。

“十大精品”项目中,最多的为86万人(同上),最少的是9.6万人(同上),也都是常设展。2个临时展览,一个11万人,一个14.2万人。

各展览观众人数差异比较大,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这里不再展开讨论。

本文用10组数字,对第二十届“十大精品”推介活动中27项境内展览入围项目做了一点简单统计,对这些数字,见仁见智,本文自无须赘言。(海粤)

常博以“星探”模式“蹚”出社教新路子

程颖 姚律



志愿者化身“三星村遗址守护者”与观众互动

沉浸式观演从“看景”到“入景”

远古时期的金坛三星村,草木茂盛、水网如织,有一群勤劳勇敢的人们在这里过着相对稳定的农业生活,他们采集、种植、打猎、捕鱼,制造各种工具,世代繁衍,生生不息。六千年来,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但我们文明溯源的脚步从未停止……在“三星炫耀”展厅中,关于这个部族的故事也正在上演……

“消失的石铎”沉浸式小剧场由常州博物馆、常州市荆川小学(市教科院附属小学)合力打造,演员均来自常州市荆川小学。剧目以部落的勇士们寻找石铎为线索展开,通过师生的倾情演绎,呈现六千多年前三星村先民们的生活画卷。

镜头转向常州博物馆志愿者团队,他们演绎的是另一个故事。博物馆讲解员坐上时光隧道机,穿梭回6000多年前的三星村聚落,与聚落中的巫巫、耀等相识,并在巫巫的带领下深入了解三星村先民们的生产生活。对于观众来说,这样沉浸式的演出对于更深入地理解展览内容、更直观地了解史前人类的生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来自江苏理工学院的李浩宇表示,这种表演对文物的保护和宣传都十分有益,看完之后有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沉浸式情景剧的定期上演,不仅让演员和观众的空间界限被打破,这种“故事演绎+沉浸式体

“触摸”金坛三星村历史,与研究专家面对面、现场体验考古发掘工作……自2023年10月起,江苏常州博物馆整合多方教育资源,创新开展集趣味性、互动性、体验性于一体的社会教育活动,将博物馆与公众的生活紧密连接,在满足人们高品质文化需求的同时,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特色活动掀起“常博变身”

2023年9月24日,常州博物馆(以下简称“常博”)年度秋季大展“三星炫耀——金坛三星村遗址特展”开幕,作为2023年常州中吴文化艺术节的重点展览,汇集了来自常州博物馆、常州市金坛区博物馆的馆藏精品300多件,是三星村遗址出土文物首次最为全面和集中的展示。

特展用静态的方式传播信息,公益讲座则以动态的讲解延伸特展的知识和文化。

如何理解中华文明进程?不同学者对于文明起源的模式有什么见解?考古工作者在常州发现了什么,这些考古出土的伴件珍品以实物资料展现出常州地区怎样的历史画卷,它们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带着这些疑问,常博在2023年10月和11月分别开展两场“常博大讲堂”公益讲座,围绕“三星村遗址与文明探源”和“寻‘常’之路‘铲’释文明”两大主题,带领观众触摸常州的历史文脉、领略“三星炫耀”主题特展的魅力,感受文明探源的目的和意义。

当博物馆将“物”与“人”实现连接与互动,馆藏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人文信息开始以别样新意传达到人们的大脑中。在“三星炫耀”特展厅,志愿者推着流动小车化身“三星村遗址守护者”,开展“智造三星村”展厅流动课堂,透过现代科技视角,通过知识讲解、道具演示、头脑风暴等多种形式,引导观众一窥先民们的智慧生活。

“遥想三星村”作为常设体验活动,利用集章、拼图、拓印、陶艺制作等多项原创设计体验项目,让观众直观了解金坛三星村出土文物的纹饰、形制以及用途,把博物馆记忆带回家。

验”的形式,还让观众随着主人公的情绪变化而变化,时空穿越感扑面而来,而“三星炫耀”主题特展则被巧妙融合在剧目中,展陈的文物构建起叙述性、多元化的演示情景和特色空间,让观众不止于“看景”,更亲身“入景”。

“活”用文物“破”知识格局

“文物是怎么被发现的?”“文物是怎么被挖掘出来的?”“文物是怎么来到博物馆的?”……

为回答观众的诸多疑问,常州博物馆面向公众开展“文物保护说”普法宣讲活动。活动依托宣讲志愿者团队,深入挖掘常州考古和常州特色馆藏的动人故事,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法律知识融入其中,让观众在故事中学习国家文物保护的相关规定和普通公众在日常生活中保护文物的正确做法。活动设计四款特色徽章,有效吸引观众参与打卡。活动以其厚重、鲜明的文化底色,将文物保护的内涵说透了、方法说清了、外延讲活了。截至2023年11月底,常博已为常州市武进区成章小学、常州工学院等29批次观众提供面对面宣讲,惠及观众千余人。

提及“馆校合作”,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成为博物馆实现社会教育功能的一种形式,以“三星炫耀”主题特展为契机,常博推动博物馆教育资源与学校教育需求的有机衔接。比如,常博与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开放大学联合开展“常州地域文明探源”馆校合作研究性学习项目,开发一系列立德启智、特色鲜明的公众考古精品线路和研究性学习课程,深入发掘和系统阐释常州地域文明的内涵和价值,帮助学生建立起完整知识框架,充分发挥博物馆实践育人作用。

让文物“说话”,借考古“通今”,观众们在互动体验中追寻文明的“源”,在发现探索中触摸文明的“流”。常博教育活动不断“蹚”出的新路子,不仅丰富了公众的历史文化滋养,也在激活文物新的生命力。下一步,常博还将陆续推出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期待公众解锁惊喜。